

葉德輝對宋元舊槧和明清善刻 的價值的體會與認識

沈 俊 平

p. 269-270

【本文提要】

葉德輝是清末民初著名的藏書家和版本目錄學家。其觀古堂藏書的一大特色是重視明清近刻的收藏。葉德輝這種重視明清近刻的藏書觀在當時可說是相當新穎的，這是因為較他稍前和同時的藏書家一般仍有佞宋嗜元，而鄙夷明清近刻的藏書觀。藏書家重視宋元舊槧，是由於在書品上至為精細考究，在內容上也較接近舊時面貌。葉德輝所以不像一般藏書家那樣重視宋元舊槧的收藏，而傾心於他們所不屑收藏的明清近刻所搜集，除了是出自他對明清近刻價值的深刻體會和認識外，一些外在而無法控制的客觀因素也起著一定的作用。

本文論討葉德輝對宋、元、明、清四朝圖書版本價值的體會與認識。首先探討佞宋嗜元藏書觀的萌芽與發展，接著討論葉德輝對宋元舊槧的價值的體會與認識，也說明葉德輝對那些佞宋嗜元的藏書家極為反感的原因。緊接著探索葉德輝對明清善刻的價值的體會與認識。最後探討葉德輝重視明清善刻的客觀因素。

一、佞宋嗜元藏書觀的萌芽與發展

宋板書傳至清代已成稀世之寶，無論賞鑑家、藏書家還是學問家，都對它們格外垂青，趨之若鶩。黃丕烈（1763～1825）號稱藏百部宋版書，曾作《百宋一廬賦》以記之，並自號「佞宋主人」，以示愛宋若痴。楊以增（1787～1855）收藏四部宋版經書和四部宋版史書，便另闢「四經四史之齋」別貯之，以示惜宋之珍。陸心源（1834～1894）合單本及叢書號稱珍藏兩百部宋版書，便顏其室曰「皕宋樓」。這種現象，有迷信、鑑賞、自標風雅的成分在裡邊，但也確有很多道理值得我們研究。

中國的雕版印刷技術，大約始於唐，成於五代，盛於兩宋、沿襲於元、明、清。雕版書雖在唐代已肇其端，但僅是以印刷技術替代手寫技術的簡單嘗試，並不普遍，也未

形成獨立形態，尚未引起書籍的整體改革。五代時政府採用了這種技術，並由四個朝代在二十二年的時間裡共同完成了《九經》的校刻任務。但由於戰亂頻仍，朝代更替不迭，這一技術及這一事業亦未得到充分的發展。宋代立國以後，長期推行重文輕武的政策，為雕版印書技術的發展和雕版印書事業的繁榮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條件，故南北兩宋刻書之多，雕鏤之廣，版印之精，流通之寬，都堪稱前所未有，後世楷模。宋代刻書，多以唐時舊本為依據，因而在文字內容上接近舊時面貌，學術價值自然就較高。而於宋人著述，則是當代人刻印當代作品，更保留了原作的精神面貌，學術價值自然就更高。這是後人，特別是學問家珍視宋本書的原因。^①所以講究版本的人，便把這些看成稀世之寶。清代學者如盧文弨(1717~1796)、顧廣圻(1770~1839)、黃丕烈、嚴可均(1762~1843)，都深知此中利弊得失。盧氏《抱經堂文集》卷十二〈書吳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後〉指出：

書所以貴舊本，非謂其概無一偽也。近世本有經校讎者，頗賢於舊本；然專輒妄改者，亦復不少。即如《九經》小字本，吾見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錫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以斯知舊本之為可貴也。^②

這裡指出了印刷較早的書籍，錯誤要比較少些；即使其中不免有些錯誤，也比較容易發現。所以顧氏《思適齋集》卷九〈《韓非子識誤》序〉中說：

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跡往往可尋也。^③

黃氏《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卷上〈《武林舊事》六卷跋〉也說：

校勘群籍，始知書舊一日，則其佳處猶在，不致為庸妄人刪潤，歸於文從字順，故舊刻為佳也。^④

嚴氏《鐵橋漫稿》卷八〈書宋本《後周書》後〉也說：

書貴宋元本者，非但古色古香，閱之爽心豁目也；即使爛壞不全，魯雨彌望，亦仍有絕佳處，略讀始能知之。^⑤

① 李致忠《宋版書敘錄》，〈自序〉（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頁1~2。

②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十二，〈書吳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後〉，見《抱經堂叢書》冊94（北京：直隸書局，1923）頁7前。

③ 顧廣圻《思適齋集》卷九，〈《韓非子識誤》序〉，見《春暉堂叢書》冊13（上海：徐氏寒木春華館，1849？），頁6前。

④ 黃丕烈著，潘祖蔭輯，周少川點校《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卷二，跋明刻本《武林舊事》六卷，頁61。

⑤ 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八，〈書宋本《後周書》後〉，見《中國學術名著第六輯·文學名著第六集》冊25（臺北：上海書局，1964），頁6後。

這些議論，都是深知甘苦之言！非有幾十年感性認識的過程，斷不能自道其所以然。陳乃乾《與胡樸安書》有這樣一段話：

嘗謂古書多一次翻刻，必多一誤。出于無心者，「魯」變為「魚」，「亥」變為「豕」，其誤尚可尋繹。若出於通人臆改，則原本盡失。宋、元、明初諸刻，不能無誤字。然藏書家爭購之，非愛古董也；以其誤字皆出於無心，或可尋繹而辨之，且為後世所刻之祖本也。校勘古書，當先求其真，不可專以通順為貴。古人真本，我不得而見之矣；而求其近於真者，則舊刻尚矣。^⑥

這段話，似乎把過去學者們珍重宋元舊本的原因都總結出來了。

宋代刻書，於書品也極為考究。一般都是開本鋪陳，行格疏朗，字體端莊，刀法剔透，印紙瑩潔，墨色青純。且版面設計精細，前期刻書，白口，四周單邊者多；中期白口，左右雙邊者多；後期出現細黑口，仍是左右雙邊者多。版心出現單魚尾或雙魚尾，上魚尾上方出現象鼻，象鼻處鐫印本版大小字數。版心下鐫印刊工姓名。魚尾之間鐫印書名簡稱、卷第、頁碼。欄外多有耳題，後期刻書還出現句讀與圈發。這種精細考究的書品，非但其本身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還成為後世刻書的楷模風範，影響中國上千年的刻書風格。^⑦

由於宋刻精良，紙墨、刀法、字體都很講究，再加上宋刻由於在時空上離古代較明清來得近，故在內容上也較接近原書，比較可信，故後世藏書家遂有重視舊刻，鄙夷新刊的思想出現。如南宋尤袤（1127～1194）《遂初堂書目》，臚載舊監本、祕閣本、杭本、舊杭本、越本、越州本、江西本、吉州本、嚴州本、湖北本、川本、池州本、京本、高麗本，而南宋盛行之建本、婺州本，卻一律不載，其輕視通常習見之本可知。據《遜志堂雜鈔》記載，明嘉靖中朱吉士大韶，性好藏書，尤愛宋時鏤刻，訪得吳門故家有宋槧袁宏《後漢記》，是陸放翁、劉須溪、謝疊山三先生手評，飾以古錦玉簽，遂以一美婢易之。婢臨行題詩於壁曰：

無端割愛出深閨，猶勝前人換馬時。

他日相逢莫惆悵，春風吹盡道旁枝。^⑧

⑥ 陳乃乾《與胡樸安書》，載《國學匯編》第一集，轉引自張舜徽《中國文獻學》（許昌：中州書畫社，1982），頁73～74。

⑦ 同註①，頁3。

⑧ 吳翌鳳《遜志堂雜鈔》庚集，清光緒十三年（1887）吳縣朱氏槐廬家塾校刊，見《槐廬叢書》冊76，頁3。

葉德輝（1864～1927）就此事評論說：

夫以愛妾美婢換書，事似風雅，實則近於殺風景。此則佞宋之癖，入于膏肓，其爲不情之舉，殆有不可理論者矣。^⑨

葉德輝以爲以美婢易佳刻乃大煞風景之事，「佞宋」到達這種程度爲不近人情之舉，簡直不可理喻。

嘉靖之間，雖有美婢易佳刻的「不情之舉」，但在藏書家和士大夫中並未形成普遍的現象。這種偏嗜宋元舊刻的風氣，到了清朝才開始形成一股風氣。葉德輝在《書林清話》卷十〈藏書偏好宋元刻之癖〉中提到這種情況時說：

自錢牧齋、毛子晉先後提倡宋元舊刻，季滄葦、錢述古、徐傳是繼之。流於乾嘉，古刻愈稀，嗜書者衆，零篇斷葉，寶若球琳，蓋已成爲一種漢石柴窯。雖殘碑破器，有不惜重貲以購者矣。昔曹溶序《絳雲樓書目》云：「予以後進事宗伯，而宗伯相待絕款曲。每及一書，能言舊刻若何、新板若何、中間差幾何，驗之纖悉不爽。然太偏性，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鈔本。雖蘇子美、葉石林、三沈集等，以非舊刻不入目錄中。」倦圃所言，切中其病。先族祖石君公，癖性亦同。徐乾學作公傳云：「所好書與世異，每遇宋元鈔本，雖零缺單卷，必重購之。世所常行者勿貴也。」《黃記》，宋刻本《聖宋文選》云：「近日陽湖孫觀察淵如，謂當取家藏宋刻書，盡加塗抹。蓋物既殘毀，時尚弗屬焉。或以不材終其天年。」按孫黃二人持論，誠爲過激之談。然其癖好宋本之心，亦云至矣。^⑩

自從錢謙益（1582～1664）、毛晉（1598～1659）提倡宋元舊刻以來，季振宜（1630～？）、錢曾（1629～1701）、徐乾學（1631～1694）更加推波助瀾，流於乾嘉，佞宋之風猶熾，至民國仍不衰歇。滎陽悔道人《汲古閣主人小傳》說毛晉「性嗜卷軸，榜於門曰：有以宋刻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二百；有以舊抄本至者，每葉出四十。」^⑪據記載，「黃蕘圃翁每於除夕，布列家藏本經史子集，以花果名酒酬之。翁自號佞宋主人」^⑫。黃丕烈佞宋是很出名的，當時就有「今天下好宋版書，未見如蕘圃者也」的說法。^⑬

⑨ 葉德輝《書林清話》（簡稱《清話》）卷十，〈藏書偏好宋元刻之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240。

⑩ 同上，頁239～240。

⑪ 滎陽悔道人《汲古閣主人小傳》，轉引自嚴佐之《近三百年古籍目錄舉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頁36。

⑫ 徐康《前塵夢影錄》，轉引自《近三百年古籍目錄舉要》，頁54。

⑬ 王芑孫《黃蕘圃陶陶室記》，見《中國歷代國家藏書機構及名家藏讀敘傳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399。

黃丕烈自己曾說過：「余生平無他嗜好，於書獨嗜好成癖，遇宋本苟力可勉，無不致以爲快」^⑭。他還自稱是「惜書而不惜錢」的「書魔」，「遇一善本，不惜破產購之」^⑮。他積數十年心血，收得宋本百餘種，築室貯之，題額「百宋一廬」，一時翹居群楚，稱雄海內。

對黃丕烈「佞宋」持異議的甚多。批評之一，認爲他「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爲深悉」^⑯，只是對版本外觀形式得鑑賞，算不上什麼學問家。批評之二，認爲他「動稱宋刻，不知即宋亦有優有劣」，是「陷於絕對化」的盲目迷信。^⑰批評之三，認爲他「是把宋元刻本當作古董來玩，看成奇貨可居，距離爲讀書而藏書的作法也太遙遠了」。^⑱實際上，黃丕烈「佞宋」並非只是鑑賞而已。正如清代著名學者王芑孫在《黃蕘圃陶陶室記》中說：「蕘圃非惟好之，實能讀之。其於版本之先後，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刪，及其授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⑲進而論之，在版本形式與版本內容兩者之間，黃丕烈看重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他認爲：「凡書不爲細校一通，第就外面觀之，謂某本勝某本，此非定論也。」^⑳又說：「既而校勘群籍，始知書舊一日，則其佳處猶在，不致爲庸妄人刪潤，歸於文從字順，故舊刻爲佳也。」^㉑這就清楚表明，黃丕烈是主張以校對版本內容異同爲判定版本優劣的主要標準，並根據這個標準得出宋版書優於後刻版本的一般規律，因此特別愛收藏宋版書。

士大夫中有一等人，趨附時尚，不懂裝懂，才是真正的「把宋元刻本當作古董來玩，看成奇貨可居」的人。這種人在明代有朱大韶，清代還有王鼎丞。而且後者的無知比前者更爲典型。清人陳其元（1811～1881）《庸閑齋筆記》說：

好古者重宋版書，不惜以千金、數百金購得一部，則什襲藏之，不特不輕示人，即自己亦不忍數翻閱也。余每竊笑其痴。王鼎丞觀察定安酷有是癖，宰昆山時，

⑭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五，跋宋刻本《三謝詩》一卷，頁187。

⑮ 石韞玉《秋清居士傳》，轉引自《近三百年古籍目錄舉要》，頁54。

⑯ 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三，見《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頁29。

⑰ 來新夏《古典目錄學淺說》（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189。

⑱ 張舜徽《中國文獻學》（許昌：中州書畫社，1982），頁399。

⑲ 同註⑬。

⑳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三，跋校舊抄本《衍極》五卷，頁106。

㉑ 同註④。

嘗買得宋槧《孟子》，舉以誇余。余請一觀，則先令人負一櫝出，櫝啓，中藏一楠木匣。開匣，乃見書。書之紙墨亦古，所刊筆畫，亦無異於今之監本。余問之曰：「讀此可增長智慧乎？」曰：「不能。」「可較別本多記數行乎？」曰：「亦不能。」余笑曰：「然則不如仍讀今監本之爲愈耳，奚必費百倍之錢以購之耶？」

王恚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賞鑒。」急收弃之。余大笑去。^②

像王鼎丞這種趨附時尚，對宋元舊槧的認識似懂非懂，盲目追求這些「珍祕」的人在當時大有人在。

二、葉德輝的藏書與版本目錄學

葉德輝，字奐彬（也作煥彬），號直山，一號邵園。其先世江蘇吳縣人。清咸豐中，太平軍進至江蘇時，其父葉肇浚舉家遷居長沙，葉德輝後捐得湘潭縣籍，遂爲湘潭縣人。光緒六年（1880）就讀長沙岳麓書院。十一年（1885）中舉人。十八歲成進士，授吏部主事。次年回湘，不復出。時王先謙（1842～1917）標榜「以提倡經學爲己任」，他與王投契，研討經學，以「決事明快」受到器重，遇事被邀入議，遂在地方紳士中漸露頭角。

維新變法時期，維新人士在湖南倡議新說與新政。^③葉德輝堅持舊學，排斥新說，撰《輶軒今語》評、《長興學記》駁義、《正界篇》等，逐一批駁。與此同時，他還攻擊新政，指斥南學會不應講「康有爲之學」，非議「開民智」、「伸民權」，誣蔑講學是「開民亂」，對《湘報》詆毀尤甚。爲杜絕新思想傳播，他同一班守舊紳士，聯名向撫院遞進《湘紳公呈》，誣梁啓超（1873～1929）等教習「陰行邪說」，要求整頓時務學堂，

② 陳其元《庸閑齋筆記》，轉引自《中華典籍與傳統文化》，頁211。

③ 關於湖南維新運動的專著和專文有林能士《清季湖南的新政運動（一八九五～一八九八）》（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72）；尹飛舟《湖南維新運動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Charlton M. Lewis, "The Hunanese Elit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895～1898",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9, 1 (November 1969)。Charlton M. Lewis 在其專著 *The Opening of Hunan: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Province, 1895～1907* (Berkeley: University Microfilms, 1969) 和 *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unan Province, 1891～1907*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re,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也有專章討論湖南維新運動。

以摒棄「異學」。繼又鼓動書院學生聚集學宮，訂立《湘省學約》，約束士子言行，防止參加維新活動。因其竭力攻擊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倡導變法，得到守舊人物稱讚，一時聲名大噪。

武昌起義後，葉德輝離湘出遊。民國四年（1915），在湖南組織籌安分會，擔任會長，擁戴袁世凱復辟帝制，後因故在一九二七年為湖南共產黨員殺害。^{②④}

葉德輝於學無所不通。繆荃孫（1844～1919）在《書林清話·序》中指出葉德輝「精研經義、文學、輿地、文詞，旁及星命、醫術、堪輿、梵夾，無不貫通」。葉德輝又是近代著名的藏書家和版本目錄學家。葉氏家道殷實，喜好收藏。繆荃孫在《〈觀古堂藏書目〉序》中指出葉德輝於「經籍、金石、書畫、陶瓷、錢幣，無不羅致」，以「賞鑑為人生一大樂事」^{②⑤}。觀古堂是葉德輝之室名及其藏書樓之名，在長沙洪家井寓宅內。清季末世，疊更喪亂。江浙文物之會，圖籍蕩佚，板刻多毀，印本漸稀。葉德輝「竭四十年心力，凡四部要籍無不搜羅宏富，充棟連櫨」。^{②⑥}據其兒子葉啟倬、葉啟慕在《〈觀古堂藏書目〉跋》之描述，葉德輝日以搜訪書籍為樂，每歲歸來，家中必當增添多櫨之新刻舊本，往往檢視彌月仍不能罄工。葉德輝好書成癖，即使在流離顛沛之中，仍不改其常度。^{②⑦}至辛亥時，插架已達卷十六萬有奇，以重刻計之，二十萬卷之外。^{②⑧}後十餘

②④ 有關葉德輝的生平與研究，詳參湯志鈞編《戊戌變法人物傳稿》，見《清代傳記叢刊·名人類》(23)（臺北：明文書局，1985），頁273～275；閔爾昌纂錄《碑傳集補》，見《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5)，頁427～429；《碑傳集補》，見《清代傳記叢刊·儒林類》(1)，內收許崇熙《邵園先生墓誌銘》頁509～511、佚名《葉邵園事略》，頁513～517；蔡冠洛編纂《清代七百名人傳》第三冊，見《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9)，頁502～503；卞孝萱、唐文權編《民國人物碑傳集》（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頁422～423；崔建英整理《邵園學行記》，見《近代史資料》第57號（1985年），頁107～145；Boorman, Howard L.(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35～37；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南省志人物志》（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頁582～583；杜邁之、張承宗《葉德輝評傳》（長沙：岳麓書社，1986）；蔡芳定《葉德輝觀古堂藏書研究》（臺灣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②⑤ 《清話》，繆荃孫《〈書林清話〉序》，頁1。

②⑥ 葉德輝《邵園讀書志》（上海：澹園，1928），劉肇隅《〈邵園讀書志〉序》。

②⑦ 葉德輝《觀古堂藏書目》（長沙：觀古堂，1905），葉啟倬、葉啟慕《〈觀古堂藏書目〉跋》。

②⑧ 《觀古堂藏書目》，葉德輝《〈觀古堂藏書目〉序》。

年又有擴張，據估計其藏書至其在一九二七年遇害止可能已超過三十萬卷。^{②⑨}以此巨數，在當時藏書家即屬不易，亦為翹楚。

值得一提的是，觀古堂藏書的一大特色，是其藏書中以明、清近刻居多。蔡芳定曾對觀古堂藏書的版本進行了統計，得出以下的數字：

	經	史	子	集	合計
宋刻	2	1	0	9	12
仿宋	37	19	30	41	127
元刻	6	6	11	7	30
仿元	5	5	4	2	16
明刻	132	206	410	318	1066
仿明	2	0	3	0	5
清刻	1791	1160	1073	1519	5543
日刻	17	12	9	4	42
活字本	13	44	42	48	147
鈔本	11	64	35	39	149
其他	33	17	41	15	106
舊刻	0	2	0	1	3
小計	2049	1536	1658	2003	7246

觀古堂藏書版本分析^{③⑩}

通過以上圖表，發現觀古堂所藏的各種版本中，以清刻本的數量最多，共 5,543 種，約占總數的 76.5%；其次為明刻本，共 1,066 種，約占 14.71%，可見明、清刻本為觀古堂藏書的主要內容，共占 91.21%，剩餘 8.79%則由其他刻本平分秋色。宋元刻本不多，若不包括仿刻本的話，僅 42 部，約占 0.6%。這在一定的程度上顯示葉德輝並非倭宋尚元之輩。

^{②⑨} 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頁 38。

^{③⑩} 蔡芳定《葉德輝觀古堂藏書研究》，臺灣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頁 46。

傅增湘（1872～1950）評葉德輝的藏書說：

吏部君奮起於諸公之後，其閱識曠才，銳欲整齊四部，網羅百家，與當代瞿、陸、丁、楊齊驅並駕，惜生逢陽九，志不獲舒，而身亦被禍，然其風流餘韻猶能沾溉後學於無窮。^{③①}

傅增湘和葉德輝是同時期的大藏書家，與葉德輝有「北傅南葉」之稱。^{③②}傅氏把葉德輝在晚清私家藏書的地位提升到和晚清四大藏書家的瞿、陸、丁、楊同等，實際上並非諛美之詞，這是因為無論是從藏書的質與量兩方面來說，觀古堂藏書都足以和四大家比美。

他利用自己豐富的藏書，從事目錄、版本、考據、輯佚研究，著述頗多。平心而論，在葉德輝廣泛涉獵的學術領域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中，唯以版本目錄學為多為重。如《書林清話》是中國第一部有系統的書史、版本學的奠基之作，學術界似已定論。《觀古堂藏書目》是葉德輝藏書樓「觀古堂」的藏書目錄，具提供資料，糾正時人鑒別觀念之偏差的功能，是古籍著錄的參考書。《郎園讀書志》為葉德輝之讀書筆記，此書詳列版本，力加考訂，是鑒別古籍版本的工具書。《觀古堂書目叢刻》總匯宋、明、清歷代官、私書目中重要而罕傳者十五種，提供原始的版本目錄資料，在中國書目文獻整理出版史上亦堪稱空前之舉，其實效至今猶存。《藏書十約》是他藏書活動的經驗總結，討論藏書管理的種種技術問題，是有志者的入門指南。〈《書目答問》斟補〉與〈校正《書目答問》序〉，則反映他在版本目錄學上的真知灼見，足為後人治學借鑒。

葉德輝的弟子楊樹達評其師的版本目錄學地位說：

縱覽吾師之盛業，殆於網羅四部，囊括九流，鑽仰有年，彌嗟卓爾。……其於史也，淹通目錄，識別版藏。凡雕刻源流，傳本真贋，莫不駢列在胸，指數如畫。

即今《讀書》一志，聲重寰中，《書林》二話，遍流海外，其明徵也。^{③③}

楊樹達出於葉德輝門下，這些言辭固有過譽之嫌，但大體亦頗得當。謝國楨（1901～1982）評對葉德輝的版本目錄學時說：

葉氏為湖南土豪，出入公門，魚肉鄉里，早被紅軍鎮壓，論其人實無可取，然精

③① 傅增湘〈長沙葉氏《紬書錄》序〉，見《拾經樓紬書錄》，《書目叢編》冊 16（臺北：廣文書局，1989），頁 4。

③② 李玉安、陳傳藝《中國藏書家辭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頁 306。

③③ 楊樹達〈《郎園全書》序〉，見楊著《積微居詩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 83～84。

於目錄之學，能於正經正史之外，獨具別裁，旁取史料，開後人治學之門徑。^{③④}謝國楨對葉德輝的版本目錄學的成就的簡短評論是中肯公允的。

三、葉德輝對宋元舊槧和明清善刻的價值的體會與認識

葉德輝對宋元舊槧持著什麼樣的態度呢？葉德輝對宋本的價值可說有深刻的體會。他在《書林清話》中曾不厭其煩的強調宋本的藝術價值。在〈宋刻書著名之寶〉中說：

宋板書白來爲人珍貴者，一《兩漢書》，一《文選》，一《杜詩》，均爲元趙文敏松雪齋故物。《兩漢書》牒文前葉有文敏小像，明時歸王弇州世貞，跋稱班、范二《漢書》。桑皮紙白潔如玉，四傍寬廣，字大者如錢，絕有歐、柳筆法。細書絲髮膚致，墨色精純，奚潘流瀟。蓋自眞宗朝刻之祕閣，特賜兩府，而其人亦白寶惜，四百年而手若未觸者。當是吳興家物，入吳郡陸太宰，又轉入顧光祿，失一庄得之，後歸錢氏絳雲樓。……（《兩漢書》）乾隆時進入內府，甲子御題云：「雕鐫紙墨，並極精妙，實爲宋本之冠。」……亦有弇州跋云：「余所見宋本《文選》，亡慮數種，此本繕刻極精。紙用澄心堂，墨用奚氏，……流傳至今僅三百年，而卷帙宛然。……」又董其昌跋云：「……其鐫手於整齊之中寓流動之致，洵能不負佳書。至於紙質如玉，墨光如漆，無不各臻其妙，在北宋刊印中亦爲上品。」乾隆御題云：「此書董其昌所稱與《漢書》、《杜詩》鼎足海內者也。紙潤如玉，南唐澄心堂法也，字跡精妙，北宋人筆意。《漢書》見在大內，與爲連璧，不知《杜詩》落何處矣。」按《天祿琳琅目》載宋版書甚多，而御題又云若此者，亦不多得。嘉慶二年，武英殿災，目載之書同歸一燼。神物久歸天上，留此題跋，可見宋本書之精妙。^{③⑤}

葉德輝引用乾隆（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王士貞（1526～1590）、董其昌（1555～1636）等人序跋說明宋版書在紙墨、刀法、字體等在形式上的講究。他在〈宋刻書紙墨之佳〉中說：

③④ 謝國楨〈叢書刊刻源流考〉，見謝著《明清筆記談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223。

③⑤ 《清話》卷六，〈宋刻書著名之寶〉，頁129～130。

先文莊公《水東日記》十四云：「宋時所刻書，其匡廓中摺行中，上下不留黑牌。首則刻工私記本板字數，次書名，次卷第數目，其末則刻工姓名以及字總數。余所見當時印本書如此。浦宗源郎中家有《司馬公傳家集》，往往皆然。又皆潔白厚紙所印，乃知古人於書籍，不惟雕鐫不苟，雖摹印亦不苟也。」明高濂《燕閒清賞箋》論藏書云：「藏書以宋刻爲善，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濕燥無湮跡。開卷一種書香，白生異味。元刻仿宋，單邊，字畫不分粗細，較宋邊條闊多一線，紙鬆刻硬，用墨穢薄，中無諱字，開卷了無臭味。有種官券殘紙，背印更惡。宋板書以活襯紙爲佳，而蠶繭紙、鵝白紙、藤紙固美，而存遺不廣，若粘梢宋書則不佳矣。」孫從添《藏書紀要》云：「若果南北宋刻本，紙質羅紋不同，字畫刻手古勁而雅，墨氣香淡，紙色蒼潤，展卷便有驚人之處。所謂墨香紙潤，秀雅古勁，宋刻之妙盡之矣。」³⁶葉德輝引用葉盛（1420～1474）、高濂、孫慶增等人對宋版書所作評論說明宋版書紙墨之精良。

對於元刻，葉德輝也給予極高的評價。他在〈元刻書勝於宋本〉中指出：

宋本以下，元本次之。然元本源出於宋，故有宋刻善本已亡，而幸元本猶存。勝於宋刻者，經則元元貞丙申平陽梁宅本《論語注疏》，勝於宋十行本也。元大德平水曹氏進德齋本《爾雅郭璞音注》，勝於明吳元恭所從出之宋本也。史則元大德九年重刊宋景祐本《後漢書》，勝於宋建安劉元起之本也。子則元大德本《繪圖烈女傳》，勝於阮氏文選樓所據刻之余氏勤有堂本也。元刻《纂圖互注揚子法言》，勝於宋治平監本也。集則元大德本《增廣音注丁卯詩集》，勝於宋版也。元張伯顏刻《文選李善注》，勝於南宋尤袤本也。元延祐庚申葉曾南阜書堂刻本《東坡樂府》，勝於宋紹興辛未曾慥刻本也。舉此數者以概其餘，是不當震於宋刻之名，而謂元明皆自檜以下也。³⁷

葉德輝舉出幾部勝於宋刻的元刻，包括元元貞丙申平陽梁宅本《論語注疏》、元大德平水曹氏進德齋本《爾雅郭璞音注》、元大德九年重刊宋景祐本《後漢書》、元大德本《繪圖烈女傳》、元刻《纂圖互注揚子法言》、元大德本《增廣音注丁卯詩集》、元張伯顏刻《文選李善注》、元延祐庚申葉曾南阜書堂刻本《東坡樂府》等。至於何以這些元刻勝於宋刻的原因，葉德輝在這裡並沒有具體說明。通過以上的說明，葉德輝重視元刻的軌跡是明顯的。

³⁶ 《清話》卷六，〈宋刻書紙墨之佳〉，頁134。

³⁷ 《清話》卷七，〈元刻書之勝於宋本〉，頁143。

元刻所以珍貴，是由於不少元刻多出白名手繕寫。葉德輝在〈元刻書多名手寫〉中云：

元刻字體有倩名手書者，《天祿琳琅》五元板史部，《山海經》十八卷，云：「字仿歐體，用筆整嚴，在元刻中洵爲善本。」乾隆御題云：「是本筆法，刻畫清峭，當爲元版之佳者。」又《後編》十一，元版集部，曾鞏《元豐類稿》五十卷云：「書法槧手，俱極古雅，麻紙濃墨，摹印精工，爲元刻上乘。」又《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槧法精朗，紙墨俱佳，元版中甲觀。」《陸續跋》，元槧周伯琦《六書正訛》五卷：「每葉八行，篆文約占小字六格，小字雙行，每行二十字，篆文圓勁，楷書適麗，蓋以伯溫手書上版者。」又元刊楊桓《書學正韻》三十六卷：「分韻編排，先篆次隸省，次訛體，條理周詳，字畫端整。」又元刊楊桓《六書統》二十卷、《六書溯源》十三卷，《瞿目》云：「桓夙工篆籀，全書皆其手寫，故世特重之。」……此類元刻，其工者足與宋槧相頡頏，特以時代論，不免有高下之見耳。^{③⑧}

葉德輝援引前人題跋，例舉出白名手繕寫的元刻來說明這些書籍字體的講究。這些出白名手繕寫的刻本，其工足以與宋槧相頡頏。

葉德輝對宋元舊槧的評價極高，本身也藏有一些宋元舊槧，雖然其數量無法和所藏明清善刻的數量比較，但我們至少知道葉德輝對宋元舊槧是不存反感的。至於真正令葉德輝反感的，是自清初以來藏書家廣泛侈言宋元舊刻而引以爲豪，卻不知鑑別的歪風。《書林清話》中多處指出這種陋習以及由此引起的作偽詐騙的惡風。

葉德輝在〈近人藏書侈言宋刻之陋〉中指責清人藏書侈言宋刻之陋習，葉氏對此表示不滿。他說：

藏書固貴宋元本以資校勘，而亦何必虛僞。如近人陸心源之以皕宋樓，自誇有宋本書二百也。然析《百川學海》之各種，強以單本名之，取材亦似太易。況其中有明仿宋本，有明初刻似宋本，有誤元刻爲遼金本，有宋板明南監印本，存真去僞，合計不過十之二三。自欺欺人，毋乃不可。至宜都楊守敬，本以販鬻射利爲事，故所刻《留真譜》及所著《日本訪書志》，大都原翻雜出，魚目混珠。蓋彼將欲售其欺，必先有此二書，使人取證，其用心固巧而作僞益拙矣。^{③⑨}

以上一則以陸心源皕宋樓爲例，指出一些藏書家爲了誇耀所藏宋元舊槧的豐富，往往把假的說成真的，企圖通過「報大數」來炫耀自己的宋元舊槧收藏。嚴格說來，這些藏

^{③⑧} 《清話》卷七，〈元刻書多名手寫〉，頁145～146。

^{③⑨} 《清話》卷十，〈近人藏書侈言宋刻之陋〉，頁222～223。

書家所藏宋元舊槧往往不過是他們所呈報的數目的十分之二、三而已。葉德輝在這裡也指出楊守敬（1839～1914）爲了商業上的利益，將「原翻雜出」的書籍都收錄在所刻《留真譜》及所著《日本訪書志》這兩部指引人們買書的參考書翻刻，來達到魚目混珠，牟取暴利的目的。深一層思考，所以會有「報大數」和用偽刻來冒充原刻的現象，全是肇自佞宋嗜元的歪風。

葉德輝在〈經解單行本之不易得〉中說：

藏書大非易事，往往有近時人所刻書，或僻在遠方，書坊無從購買；或其板爲子孫保守，罕見印行。吾嘗欲遍購前續兩《經解》中之單行書，遠如新安江永之經學各種，近如遵義鄭珍所著遺書。求之二十餘年，至今尚有缺者。可知藏書一道，縱財力雄富，非一驟可以成功。往者覓張惠言《儀禮圖》、王鳴盛《周禮田賦說》、金榜《禮箋》等書，久而始獲之，其難遇如此。每笑藏書家尊尚宋元，卑視明刻，殊不知百年以內之善本，亦寥落如景星。而宋千元，斷非人人所敢居矣。^④

葉德輝以自己的經驗來說明藏書之道，非單憑財力雄厚就可以成功，往往需要依靠幾分運氣不可。葉德輝在這裡譏笑崇尚宋元，卑視明刻之人的尚不自覺百年以內的善本已寥若晨星，仍舊花費大量力氣追求，以求達到宋元千元的境界。

雖然宋元舊槧日益寥落，但追求此道的人仍舊不少。宋元舊槧於是在藏書家的搶購下，致使其身價有日益膨脹的趨勢。葉德輝在〈宋元刻本歷朝之貴賤〉中說：

宋元刻本，在明時尚不甚昂貴。觀毛扆《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所列之價目，在今日十倍而廉矣。中如宋版影鈔李鼎祚《周易集解》十本，價五兩。元板《周易兼義》八本，價四兩。綿紙抄本《禮記集說》四十二本，價二十兩。名人墨抄，如秦西岩手抄《太和正音譜》二本，價二兩。周公謹弁陽山房抄本《絳帖平》二本，價一兩二錢。其餘一二本之抄本，皆三錢五錢。其中最貴者，宋影抄《杜工部集》十本，價三十兩。《宋詞一百家》精抄，價一百兩。然宋詞一家各一兩，乃不爲貴。……若以書目所載數目論之，則售出時固未嘗一索高值也。大抵明時宋元本書，本不十分昂貴。……國初康熙時書價漸貴。王士禛《分甘餘話》二云：「趙承旨家宋槧前後《漢書》，錢牧齋大宗伯以千二百金購之新安賈人，後售於四明謝氏，後又歸新鄉張司馬坦公。康熙中有人攜至京師，索價甚高，真定梁蒼岩大司馬酬以五百金，不售攜去，後不知歸誰何矣。」又《居易錄》云：「《通鑑紀事本末》，宋刻大字，有尚寶司卿柳庄袁忠徹家藏印及陸子淵、項子京諸印。浙江人攜至京師，索價百二十金，留二日而還之。」錢遵王《敏求記》云：「李

④ 《清話》卷九，〈經解單行本之不易得〉，頁206。

誠《營造法式》三十六卷，以四十千從馮魚山購歸。」《黃記》：「《賓退錄》十卷校宋鈔本，王聞遠跋：『今康熙六十有一年歲壬寅孟夏，書估王接三持宋槧五冊來，索價十金，無力購之。』」……此由國初至康熙末年書價之可考者。^{④①}

以上引文說明宋元刻本的價錢隨著時代的愈晚，流傳的愈少，價錢也隨之愈高。這是自明到清康熙末年的情形。這種情形發展到了乾嘉時期非但沒有改善，反而因為「有力者」的勤力收藏，「其價已過康熙時十倍」。葉德輝參考了諸家題跋後，整理出一些宋元刻本在乾嘉時期的「叫價」。試舉以下幾部古籍的價錢為例：

• 宋板《春秋繁露》十七卷	一百兩
• 朱竹垞曝書亭藏本《輿地廣記》三十六卷	一百二十兩
• 宋本《吳郡圖經續記》三卷	五十兩
• 宋刻《歷代紀年》十卷	二十兩
• 殘宋本章衡《編年通載》四卷	四十兩
• 宋余仁仲《公羊解詁》十二卷	一百二十兩
• 宋本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十卷	二十四兩
• 宋本《新序》十卷並宋小字本《列子》八卷	八十兩
• 北宋本《說苑》二十卷	三十兩
• 宋本《管子》二十四卷	一百二十兩
• 宋本《史載之方》二卷	三十兩

通過以上的例子，我們發現宋刻到了乾嘉時期的市價已有顯著提升。到光緒年間，「宋板書本日希見」，在時人的眼裡宋刻已成為古董，價格繼續往上爬升。據葉德輝見聞所及，張之洞（1837～1909）以三百金購宋板《詩經朱子集傳》、徐梧生以三百金購北宋本《周易正義》。「北京拳變以後，舊本愈稀」，葉德輝聽說京師書估以五百金的高價售出李璧《雁湖集》，又聽說「貴池劉某以番餅四百圓得汲古舊藏宋本《孔子家語》」；縣人袁思亮以三千金購宋牧仲翁潭溪所校殘宋本《施注蘇詩》。在葉德輝的眼裡，這些人收購古書根本不是出自對古書的由衷愛好，他們收購古書的目的是一是為了「鬪富爭奇」，向人們炫耀他們的財力，二是「視古書如古玩」，把這些古書看成是投資的物品，這些人是葉德輝所不屑的。^{④②}

與此同時，古書一旦成為商品，價值規律就必然發生作用。一切在市場上通常出現的現象也必然在書市上反映出來。古刻愈稀，零篇殘頁，寶若珠琳，本是自然之理；再加上一些佞宋派哄抬市價，爭相搶購，就造成書賈有利可圖，乘機假造宋版書以投其所

④① 《清話》卷六，〈宋元刻本歷朝之貴賤〉，頁138～142。

④② 同註④①。

好。葉德輝在〈坊估宋元刻之作偽〉則中反映了偏嗜宋元刻本之風帶來書估作偽的惡風。他說：

白宋本日希，收藏家爭相寶貴，於是坊估射利，往往作偽欺人。變幻莫測，總之不出以明翻宋板剝補改換之一途。或抽去重刊書序，或改補校刊姓名，或偽造收藏家圖記，鈐滿卷中，或移綴真本跋尾題簽，掩其贗跡。就《天祿琳琅》所辨出者，已有十餘種之多。蓋貢之尚方之時，人人如野人之獻芹。初未嘗有所區別，及經諸臣鑒別，而後涇渭分明。今悉載之，藏書家當取為秦宮鏡矣。^{④③}

據葉德輝的考察，偽造宋元舊刻的手段不外有以下幾種：(一)抽去重刊書序；(二)校改校刊書名；(三)偽造收藏家圖記，鈐滿卷中；(四)移綴真本跋尾題簽，掩其贗跡。以上所舉，僅僅是某些舊書肆作偽的其中幾種手段。其他一些作偽手法的高超，是一般人所無法想像的。^{④④}這種偽造的書籍，除非是內行人，否則一般凡夫俗子是無法識別的。這些作偽現象的流行，所造成的混亂是可想而知的。對一般學子而言是大為頭痛的問題，他們可能因為鑒別能力有限，無法知道所據的本子是真是偽，無所適從，對學術的研究肯定起了負面影響。

實際上，據過去學者的觀察，宋代刻書除了有錯字、有脫句，也有經當時刻書之人任意增損的地方。如果認為舊本書一無謬誤，那就必然會犯嚴重的錯誤。首先我們必須明白宋代版本很複雜，有如杭世駿（1697～1772）《道古堂集》卷十八〈欣托齋藏書記〉所云：

今之挾書以求售者，動稱宋刻。不知即宋亦有優有劣。有太學本，有漕司本，有臨安陳解元書棚本，有建安麻沙本，而坊本則尤不可更僕以數。^{④⑤}

這裡所例舉的版本，還只是宋本中的一部分。其中麻沙本為最劣，而流布最廣。由於刻印過多，偽文脫字，所在皆是。在宋代時，便有人十分鄙棄。陸游（1125～1210）《老學庵筆記》卷七說：

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為金，坤又為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云：「……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為釜』也。」^{④⑥}

④③ 《清話》卷十，〈坊估宋元刻之作偽〉，頁217～218。

④④ 關於書估作偽的手段，可參閱屈萬里、昌彼得《書估作偽》，見學海出版社選輯《中國圖書版本學論文選輯》（臺北：學海出版社，1981），頁167～173。

④⑤ 杭世駿《道古堂集》卷十八，〈欣托齋藏書記〉，轉引自張舜徽《中國文獻學》，頁76～77。

④⑥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七，見《四庫筆記小說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62。

周輝《清波雜志》卷八也說：

印版文字，訛舛爲常。蓋校書如掃塵，旋掃旋生。……若麻沙本之差舛，誤後學多矣。^{④7}

這都是宋人的可靠實錄。陸游更在《跋歷代陵名》中，深切地指斥道：

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版，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爲愈也。^{④8}

這又是何等痛惡之情！宋本書所以存在許多舛誤，歸納起來，不外兩個來源：一是刻書時所造成的訛謬；一是校書時所遺留的損害。清代學者曾一一指出來了。顧廣圻《思適齋集》卷十〈重刻《古今說海》序〉有云：

南宋時，建陽各坊刻，刻書最多。每刻一書，必倩雇不知誰何之人，任意增刪換易，標立新奇名目，冀以銜價，而古書多失其真。^{④9}

這種後果，自然應由刻書者負責的。其次如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二〈重雕《經典釋文》緣起〉所說：

今之所貴於宋本者，謂經屢寫則必不逮前時也。然書之失真，亦每由於宋人。宋人每好逞臆見而改舊文。如陸氏雖吳產，而其所匯輯前人之音，則不盡吳產也。乃毛居正著《六經正誤》一書，譏陸氏偏於土音，因輒改他字以易之。後人信其說，遽以改本書矣。^{⑤0}

這樣的後果，自然應由校書者負責的。由此可見，宋代的刻書者和校書者，替書籍帶來的損失，確是不小。宋本如此，元刻可知。我們今天沒有理由把宋元舊槧看成一無訛誤的本子。

葉德輝對宋元舊槧極爲重視，然沒有淪爲盲目的崇拜。經過他的精心考證後，發現宋刻書也並非全無謬誤的。他在〈宋刻書多訛舛〉中說：

王士禎《居易錄》二云：「今人但貴宋槧本，顧宋板亦多訛舛，但從善本可耳。如錢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參』詩，從宋刻作『兩腳但如舊』，而注其下云：『陳本作雨。』此甚可笑。《冷齋夜話》云：老杜詩『雨腳泥滑滑』，世俗乃作『兩腳泥滑滑』。此類當時已辨之，然猶不如前句之必不可通也。」吾謂不特此

④7 周輝《清波雜志》卷八，見《四庫筆記小說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57。

④8 陸游《跋歷代陵名》，轉引自張舜徽《中國文獻學》，頁75。

④9 《思適齋集》卷十，〈重刻《古今說海》序〉，頁13後。

⑤0 《抱經堂文集》卷二，〈重雕《經典釋文》緣起〉，見《抱經堂叢書》冊91，頁18前。

也。如盧文弨《抱經堂文集》所跋《白虎建德論》，宋刻二卷本，開卷即訛「通德」爲「建德」。《陸志》載宋刻任淵注《山谷黃先生大全詩注》二十卷，前序稱「紹興鄞陽許尹敘」，紹興下脫年月，均爲可笑。又《陸跋》宋本《王右丞集》十卷云：「卷六末有跋，凡七十餘字，爲元以後刊本所無。卷五《送梓州李使君》『山中一半雨』，不作『山中一夜雨』，與《敏求記》所記宋本同。惟卷二《出塞作》，脫二十一字，不免白璧微瑕耳。」然如此類，豈僅微瑕，實爲大謬。《錢日記》載宋蔡夢弼刻《史記》，目錄後題識，稱「乾道七月春王正上日書」，七月「月」字，爲年之訛。《繆續記》載宋阮仲猷種德堂本《春秋經傳集解》，前牌子方印文「了無窒礙」，窒誤作「室」。此雖小誤，則其校讎不善可知，且又安知書中如此類者，不爲佞宋者所諱言乎！古今藏書家奉宋槧如金科玉律，亦惑溺之甚矣。^{⑤①}葉德輝援引前人的考證以及自己的觀察指出宋刻書在字句上的訛誤。他在〈宋刻書字句不盡同古本〉中說：

藏書貴宋本，人人知之矣。然宋本亦有不盡可據者。經如《四書朱注》本，不合於單注單疏也。其他《易程傳》、《書蔡傳》、《詩集傳》、《春秋胡傳》，其經文沿誤，大都異於唐、蜀《石經》及北宋蜀刻。宋以來儒者但求義理，於字句多不校勘。其書即屬宋版精雕，只可爲賞玩之資，不足供校讎之用。南宋刻書最有名者，爲岳珂相台家塾所刻《九經三傳》，別有《總例》，似乎審定極精，而取唐、蜀《石經》校之，往往彼長而此短。故北宋蜀刻諸經之可貴者，貴其源出唐、蜀《石經》也。宋本中，建安余氏所刻之書不能高出俗本者，爲其承監本、司、漕本之舊也。至於史、子，亦以北宋蜀刻爲精，如《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見於各藏書家題跋所稱引者，固可見其一斑。子如《荀子》，熙寧呂夏卿刻本，勝於南宋淳熙江西漕司錢佃本。《世說新語》北宋刻十行本，注文完全，勝於南宋陸游本，此固未可概以爲宋刻而遂一例視之，不復之辨別也。^{⑤②}

葉德輝透過唐、蜀石經來和宋本的校勘後，發現有些宋刻如《易程傳》、《書蔡傳》、《詩集傳》、《九經三傳》等和唐、蜀石經在字句上有不盡相同的地方，乃得出「宋刻書字句不盡同古本」的結論。

^{⑤①} 《清話》卷六，〈宋刻書多訛舛〉，頁132。

^{⑤②} 《清話》卷六，〈宋刻書字句不盡同古本〉，頁131。

通過以上的討論，說明葉德輝是肯定宋刻的價值的，特別對講究紙墨、刀法、字體的宋刻讚不絕口的。葉德輝所不滿的，是清人對宋元舊槧的追求超過了極限，變成了一種盲目的追求，以為凡宋元舊槧必佳，養成鄙視近刻和時刻的錯誤觀念。這種觀念一產生，連帶的產生了書估作偽的惡風，市面上摻雜著素質良莠不齊的版本，不僅使一般士子無所適從，不知何者是最可信、最可據的本子，也使得文獻工作者的典籍研究工作倍加艱難。葉德輝通過校讎的手段發現，宋本雖距離原刻的時代較早，在內容上理應最接近原刻，是最可信、最可據的版本。就一般的情形而言，這種說法並沒有不正確的地方。但就少數的情形來說，由於種種外在因素的影響，如刻工的疏忽、校對者的馬虎等，再加上刊印者有意無意的犯錯，使得宋元舊槧在字句也有訛誤的地方。由於一般藏書家非行家法眼，識見不高，對宋元舊槧的收藏只是出於「炫耀財富」和「投資」的目的，對宋元舊槧的內容好壞也就不加辨別，盲目追求，自欺欺人。葉德輝的這種見解，純粹是從學問家的學術的角度來看。因為學問家在看待一部書的好壞時，書的外表形式對他而言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書的「內在美」，即書的內容是否完整、確實。

在葉德輝看來，一向為清代藏書家和目錄版本學家所忽視的明刻和近刻，其中實不乏珍品。這是因為明刻和清刻無論從內容和書品來說都不會比宋元刻本遜色，有些甚至凌駕宋元刻本之上。葉德輝在〈明人刻書之精品〉中例舉了明人家刻中之精品，其中包括豐城游明大升、吳郡沈辨之野竹齋、昆山葉氏葦竹堂、江陰涂禎、錫山安國桂坡館、震澤王延哲恩褒四世之堂、吳郡金李澤遠堂、吳門龔雷、吳郡袁紱嘉趣堂、顧春世德堂、澶淵晁璠寶文堂、南平游居敬、餘姚聞人詮、金台汪諒等等的刻書，是「為收藏家向來珍賞」的明刻本。⁵³

至於清刻中的珍品，葉德輝在〈國朝刻書多名手寫錄亦有自書者〉中說：

國初諸人刻書，多情名手工楷書者為之。如倪靄為薛熙寫《明文在》，侯官林吉人估為王士禎書《漁洋精華錄》，為汪琬書《堯峰文鈔》，為陳廷敬書《午亭文編》，常熟王子鴻儀為漁洋書《詩續集》。均極書刻之妙。徐康《前塵夢影錄》云：「乾嘉時，有許翰屏以書法擅名。當時刻書之家，均延其寫樣。如士禮居黃氏、亨帚樓秦氏。平津館孫氏、藝芸書舍汪氏以及張古餘、吳山尊諸君，所刻影宋本祕籍，皆為翰屏手書。一技足以名世，洵然。」《錄》又云：「嘉慶中，胡果泉方伯議刻《文選》。校書者為彭甘亭、顧千里。影宋寫樣者為許翰屏，極一時之選。即近時所謂《胡刻文選》也。」……同時，長州有李福為士禮居寫明道本《國語》，吳縣陸損之為士禮居寫《汪本隸釋刊誤》。幸皆於刻本著名，使姓名與書不朽。

⁵³ 《清話》卷五，〈明人刻書之精品〉，頁101～106。

至黃丕烈寫《季滄葦書目》，余秋室學士集書元周密《志雅堂雜鈔》、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孫承澤《庚子消夏記》、《百衲琴》。許槿寫元李文仲《字鑒》、《六朝文絜》、吳玉搢《金石存》，江元文寫王芑孫《碑版廣例》，顧南雅學士純爲錢大昕寫《元史藝文志》。初刻初印，直欲方駕宋元。^{⑤④}

清代刻書家刊刻典籍時也極爲講究字體，多僱用著名刻工爲之，又延請名家校勘，絲毫不馬虎，故清代刻本的價值不會比宋元舊槧低。清刻、時刻所以從內容和書品來說都不遜於宋元刻本，是由於自康、雍、乾、嘉以來，「累葉承平，民物豐阜，士大夫優游歲月，其著書甚勇，其刻書至精，不獨奴視朱明，直可上追天水。」^{⑤⑤}

通過以上討論，知道葉德輝對於明刻和近刻也心存好感。在他看來，明刻和近刻無論從內容和書品來說都不會比宋元刻本來得差。因此，葉德輝極爲重視明刻和近刻的收藏。

四、葉德輝重視明清善刻的原因

實際上，葉德輝之所以重視明刻和近刻甚於宋元刻本，多少有些無可奈何的成分在內。這是因爲宋元刻本到了葉德輝的時代已愈來愈稀。所以這樣是因爲晚清距離宋元明時代久遠，在這長時期的歷史長河中，不知經歷了多少天災人禍。以葉德輝生活的晚清而言，就曾經歷了不少內憂外患。

內憂方面對典籍的破壞，葉德輝就曾親身經歷。他在《書林清話》卷九〈吳門書坊之盛衰〉中說：

緒寇亂起，大江南北，遍地劫灰。吳門二三百載藏書之精華，掃地盡矣。^{⑤⑥}
葉德輝在這裡指出經動亂以後，吳門兩三百年以來藏書之精華幾一掃而空。以小見大，可見內部動亂對典籍破壞的程度的嚴重。陳登原在《古今藏書聚散考》說：

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庫》成書以後，下迄道光初年，其間雖有白蓮教、天理教之亂，其間雖有廓爾喀、平臺灣等之軍事，然前者，則其範圍不大；後者則偏於對外，故於四庫劫後之圖書，似無多大關係。其與典籍有關者，則道光三十年，洪秀全起兵於廣西之金田是也。^{⑤⑦}

⑤④ 《清話》卷九，〈國朝刻書多名手寫錄亦有自書者〉，頁202～203。

⑤⑤ 《郎園讀書志》卷一，跋嘉慶十年原刻本《儀禮圖》六卷，頁58後。

⑤⑥ 《清話》卷九，〈吳門書坊之盛衰〉，頁256。

⑤⑦ 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見《民國叢書》第二輯冊50（上海：上海書店），頁233～234。

清政府修纂《四庫全書》時，包含禁書毀書的企圖，當時遭禁毀的典籍不少。太平天國起義是白《四庫》完成修纂後另一對典籍破壞極為嚴重的禍患。太平天國起義涉及的範圍有多大呢？又以哪個地區受影響最深呢？陳登原說：

洪氏以道光三十年（1850）起兵廣西，及咸豐三年（1853）而定南京。同治三年（1864），曾國荃攻拔金陵，秀全自殺。蓋擾攘之時，計十五年之多，而被殺之域，亦及十六省之多。又以太平天國定都東南，故所受之兵燹，亦以江浙兩省為甚。江浙固私人收藏之中心也。⁵⁸

這次起義受影響最大的是素為私人藏書中心的江浙地區。至於破壞的程度如何，陳登原亦有論述：

嘗見無名氏之《焚書論》曰：「余生不幸，雖未坑儒，業已焚書，所見者洪逆之亂，所至之地，倘遇書籍，不投之於溷廁，即置之於水火。遂使東南藏書之家，蕩然無存。幸叛逆不久誅滅，故西北所藏之書，猶有見存者。其毒雖流於一時，尚未遍及於天下也。」殊不知自明以來，私人收藏之事業，久已偏於東南。故東南之有兵燹，乃私人收藏事業之大劫焉。⁵⁹

據無名氏《焚書論》所述，東南地區私人藏書經太平天國起義後已「蕩然無存」，所幸這次起義未波及西北地區，尚且保留一部分的典籍。陳登原不盡同意無名氏的說法，他以為自明以來私人藏書事業已偏於東南，幾乎所有重要的私家藏書皆聚集在這個地區。比較起來，其他地區的藏書顯得微不足道。故若這個地區遭兵燹，對私家藏書事業而言是為一場大浩劫。

北方藏書私人事業在太平天國起義期間雖倖免於難，但最後也難逃兵燹的破壞。就以北方私家藏書樓代表的楊氏海源閣來說也擺脫不了遭兵燹破壞的命運。陳登原說：

髮匪之在南方也，北方尚有與髮匪相應之捻匪。其起也，遲於太平天國，而其平也，亦較後。

當日北方藏書，自御府珍祕之外，即集中於山東聊城楊氏之海源閣。……海源為山左藏書之鉅擘。……然咸豐辛酉（十一年），皖寇之亂，且毀其十之三四矣。閣主人楊紹和跋宋本《毛詩》條云：「辛酉皖寇擾及，齊魯之交，烽火亘千里，所過之處，悉成焦土。二月初，犯肥城西境，據余華附莊、陶南山館一晝夜。白

⁵⁸ 同註⁵⁷。

⁵⁹ 同註⁵⁷。

分珍藏圖籍，必已盡劫灰。及寇退，收拾燼餘，幸猶十存五六。而宋元舊槧，所焚獨多，且經部尤甚。……」雖曰幸存五六，然海源閣上宋存書室之四經四史齋，竟致不易復厥舊觀；亦可見其禍之烈。^{⑥0}

在北方私家藏書樓居首的海源閣，經捻軍的破壞後，損失了超過一半的珍祕典籍。

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了解清季時的內部動亂確實對私人藏書事業有著極大的破壞，可以想見當時典籍遭到毀壞的程度。

外患方面，對典籍起過嚴重摧殘有道光時的鴉片戰爭、咸豐時的英法聯軍、光緒時的八國聯軍。陳登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記載了鴉片戰爭中典籍破壞的情形：

以鴉片戰爭而言，道光庚子（1840），英法侵入寧波。寧波有明以來之天一閣，藏書稱盛。……英人入甬以後，登閣周覽，取《一統志》及其他地志而去也。天一地志，為私人收藏之冠；英人竟乘火打劫，此外人藉兵亂，取我典冊之原始記載也。^{⑥1}

鴉片戰爭之役使得天一閣所藏《一統志》、地方志盡遭英人所劫。至於英法聯軍給予中國典籍的破壞，陳登原亦有記載：

英法聯軍之役，肇始於咸豐七年（1857），終於咸豐十年。圓明園中之《四庫全書》，即焚於此役。^{⑥2}

英法聯軍之役使得藏於圓明園中的《四庫全書》遭焚毀。然而，晚清三次外患給中國典籍帶來的破壞，陳登原以為以八國聯軍之役的破壞程度最嚴重。他說：

然外患中，書籍遭厄之甚者，則莫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之役，聯軍占領北京之時，號稱為中國百科全書之《永樂大典》，雖由以前已有散佚；然最後之亡散，即亡散於此役也。^{⑥3}

通過以上文獻，說明外患給予公家藏書事業極大的破壞。在這種內外夾攻的情況下，導致古籍（特別是已是稀有宋元舊槧）在人間消散得更加迅速，能夠完整保留下來的已是鳳毛麟角了。這也就難怪乎葉德輝要實事求是地再新檢討他的版本觀，並發現明清刻本中亦有不少不遜於宋元舊槧的善刻。在這種新版本觀的基礎上，乃積極從明清刻本中尋找有價值的善刻，以彌補宋元舊槧嚴重短缺的缺陷了。

⑥0 同註⑤7，頁236～237。

⑥1 同註⑤7，頁249。

⑥2 同註⑤7，頁249～250。

⑥3 同註⑤7，頁250。

最後，和宋元舊槧比較起來，明清善刻的書價顯然廉宜得多。若藏書家藏書的目的是為讀書，又若時刻在內容上和原刻舊刻並無兩樣，能夠滿足學術研究基本要求，那他們一般都不太渴求舊刻善本。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既然葉德輝是為學術研究的需要而藏書，而明清善刻在他經驗中也不乏精品，且書價也較便宜。這麼一來，搜集明清善刻也並無不妥的地方，也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作法。

不管葉德輝重視明清善刻的意圖如何，這種新穎的版本觀在當時的私人藏書界來說可說是獨樹一幟的，打破了以往倭宋尚元的版本觀。

（本文作者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圖書館助理圖書館員）